
中国近代帮会史研究

邵 雍 著



| 转型期中国社会研究丛书 主编 唐力行

中国近代帮会史研究

邵 雍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帮会史研究/邵雍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转型期中国社会研究丛书/唐力行主编)

ISBN 978-7-208-10218-7

I. ①中… II. ①邵… III. ①帮会—历史—中国—近代—文集 IV. ①D693.7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3915 号

责任编辑 周 珍

封面设计 王小阳

· 转型期中国社会研究丛书 ·

唐力行 主编

中国近代帮会史研究

邵 雍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1.75 插页 4 字数 276,000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218-7/K · 1805

定价 45.00 元

总 序

唐力行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半个多世纪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形成了求实、创新的学风,扬长避短,开辟了一些颇有特色的研究领域。目前已建立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是上海师大历史学科中最具特色、最充满活力的二级学科之一。1982年,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4年成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所。2000年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立,2001年在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并于同年被评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2005年升格为上海市重点学科(第二期)。目前,我们正在同时建设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上海市重点学科(第三期)。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变迁、下层社会和帮会研究是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同仁以转型期中国社会研究为中心,形成了以下四个特点:整体中国与区域社会研究相结合;长时段与短时段相结合;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研究相结合;注意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

为加强与国内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我们在上海市教委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由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编号SJ0703)、上海市重点学科第三期(编号S30404)资助,出版《转型期中国社会研究丛书》,陆续推出同仁之研究成果。希望我们的成果能为史学园地添加几分春色。

2010年5月8日

自序

帮会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社会现象。魏建猷教授是中国史学界最早研究帮会史的著名学者之一。在他的引领下上海师范大学成为国内外研究秘密社会的学术重镇之一，帮会史研究是我校历史学科的主要学术品牌之一。

收入本书的31篇文章是从我近三十年来所写的大量帮会史论文中挑选出来的，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研究对象定位准确，突出帮会这一主体。《论闽南小刀会起义》、《1853年台湾天地会大起义》、《林俊起义述略》、《湖南嘉禾天地会起义》、《江西南康会党起义》、《汉奸帮会组织——中华洪门联合会》、《益社始末》、《正诚社始末》、《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中和党”》、《刘文彩与袍哥》、《帮会与女性》等文完全以帮会的思想、行为与生活为主线展开论述，其他的即使很重要也只能作为帮会产生、兴盛的背景，严防渲染过度，喧宾夺主。而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这一领域关注不够，鲜有专论。

二、史料确凿可信，而且未刊的占有较大的比例，有新鲜感。成功的历史论文有赖于真实可信的历史资料。写作过程中，本人尽力所能及，广为搜集以档案为中心的各种重要史料，尤其是认真查阅了1919年至1949年的全部《申报》，逐日查找有关帮会言论与活动的线索。正因为资料方面下了苦功夫，才使笔者自信这些论文是有保存价值的，如《民国时期帮会史研究的发展及其特点》本身就是一篇史学史方面的

论文;《常玉清和黄道会》一文利用了法院的档案材料;《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探略》利用了包括公安部门在内的档案材料。此外《论苏元春与会党的关系》、《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帮会》、《五四运动与青红帮会》、《常玉清和黄道会》、《阎锡山与青洪帮会》也属于这类。这些文章内容虽不能完全说是鲜为人知,至少也是在以往同类论著中语焉不详的。即使不同意其中的某些观点读者也可以通过论文中的史料来比较深切地感受这段历史,走进帮会这个下层社会群体。

三、注意研究帮会在特殊历史发展节点上的政治表现。帮会是中国近代秘密社会的两大系统之一,平时潜行默运,难觅踪迹,其核心机密更是深藏不露。只有在特殊历史发展节点上,在民族抗争、阶级斗争尖锐化之时,帮会才会出头露面,呼风唤雨,大显身手。《鸦片战争时期的帮会》、《甲午战争前后的会党问题》、《日本侵略者利用中国帮会破坏抗战述略》、《1939年至1942年国民党利用帮会反共述略》、《1945—1947年间秘密社会的组党风潮》等文充分揭示了这一历史现象。笔者认为,研究帮会在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激烈搏斗之时的政治表现更接近历史真实,更能说明它的本质特性,因而也更有价值。

四、力图还原历史,对帮会代表人物进行分阶段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以往对于帮会在近代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笔者认为不应以某人的前过抹杀后功,也不以某人的后功掩盖前过。《关于袁文才、王佐的几个问题》、《杜月笙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均属于这类。特别是《杜月笙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一文纠正了以往对杜月笙的脸谱化解读,旗帜鲜明地肯定了他为国家为民族所做的有益的工作。

五、革命政党、领袖与帮会的关系是帮会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以往刻意绕开、回避或屏蔽或漂白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态度。《论黄兴与会党的关系》、《1911年春孙中山加拿大之行述略》、《五卅运动

中的工人帮会问题》、《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会党的政策》等文把这一重大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了科学的阐释。《论近代秘密社会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一文则从国家、社会与民众的互动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偏重理论的说明。

本人自1982年考入魏建猷先生门下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时开始进入帮会史研究的领域已近三十年了,先后撰写的帮会史论文多达近百篇,而且散见于各种报章杂志,本专业的研究生们以及一切有兴趣的读者要想阅读全部,费时劳神,翻检不易。今有机会将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结集出版,供广大读者阅读参考,接受学界的批评,实为幸事。是为序。

2011年5月10日

目 录

自序	1
鸦片战争时期的帮会	1
论闽南小刀会起义	9
1853 年台湾天地会大起义	49
林俊起义述略	60
湖南嘉禾天地会起义	74
江西南康会党起义	77
帮会史中的女性	80
论苏元春与会党的关系	83
甲午战争前后的会党问题	93
论黄兴与会党的关系	104
1911 年春孙中山加拿大之行述略	113
辛亥革命与上海帮会	131
张云山与陕西光复	142
民国时期帮会史研究的发展及其特点	153

五四运动与青红帮会	168
五卅运动中的工人帮会问题	179
关于袁文才、王佐的几个问题	189
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会党的政策	194
杜月笙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	208
1939 年至 1942 年国民党利用帮会反共述略	224
日本侵略者利用中国帮会破坏抗战述略	233
常玉清和黄道会	250
汉奸帮会组织——中华洪门联合会	255
阎锡山与青洪帮会	260
1945—1947 年间秘密社会的组党风潮	269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中和党”	282
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探略	288
刘文彩与袍哥	299
正诚社始末	314
益社始末	317
论近代秘密社会与民主革命的关系	322
后记	335

鸦片战争时期的帮会^①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是中华民族民族觉醒的开端。探讨处于中国下层社会的帮会在鸦片战争前后的表现,揭示会党在中国军民与外国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时的所作所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国情,有助于认清近代帮会的性质和特点。

中国帮会主要可分为青、洪帮两大系统。洪帮即天地会系统,其确切的历史是从乾隆二十六年洪二和尚在福建漳浦结会开始的。天地会自乾隆四十年遭到沉重打击后,“复改双刀、仁义、百子等项会名,多方利诱,惑众骗钱”^②。1838年前后“复有三点会结党聚众,其势尤炽”^③。广东濒海近洋,三合会众“勾连凡五六省”,“剽掠乡曲”,抢劫商旅“无所忌憚”^④。三点会在1839年左右也是“抢赎勒赎,杀人放火”,无所不为。^⑤江西“赣州、南安二府,界连闽、粤,向多外匪窜入,结党拜会,肆行

① 原载《历史档案》1995年第3期。

② 《天地会》(六),第22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天地会》(六),第241页。

④ 《天地会》(六),第518—519页。

⑤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32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中国近代帮会史研究

窃抢”^①，南昌、饶州、抚州连界地方又有“强丐结队同行，……结盟拜把，……倚恃人众，抢窃滋扰”^②。因此，从道光初年至鸦片战争爆发，并没有发生过一起较大规模的反清斗争，清政府此间破获的帮会案件多为骗钱杀人等刑事案件。

中国帮会的另一大支青帮信奉明代人罗清为始祖，传习“罗祖大乘教”，发展至道光年间尚处在漕运粮船水手秘密结社阶段。“粮船水手……均由习教之老管师父招雇上船，各分党羽，恃众逞强”^③，分有杭三、兴武、嘉白等帮。粮船回空时又“每多无籍匪棍，勾结水手，随帮南下，谓之青皮”，抢劫命案多出于此辈之手。^④青皮党是道光年间依附漕船贩运私盐的盐枭集团。鸦片战争前，青帮在盐枭中也多有发展。淮安、扬州、靖江等处既是漕运要道又是两淮产盐之集散地，“向为盐枭出没之所”^⑤，“枭徒中有老大名目、即系杖头别称”^⑥。而仪征县城濒临大江，为“商运捆盐之地，即为枭匪丛集之区”^⑦，盐枭“平日争夺码头打仗”，凶狠“过于战阵”^⑧，没有自觉地进行反抗斗争的明确政治意识。

中国青、洪帮会正是在这种组织体系散乱、日常行动扰乱、政治方向不明的状态下步入鸦片战争时期的。

19世纪30年代末由于国外鸦片非法输入猛增，中国白银外流日益严重，道光帝亲自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禁烟运动。这场运动是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身心健康的正义斗争，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然而贩烟成性的广东三合会仍不思悔改，不但不加收

① 《天地会》(六)，第41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天地会》(六)，第377页。

③ 《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312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④ 《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319页。

⑤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4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⑥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19—120页。

⑦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1页。

⑧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第5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敛,反而一改抢掠贩烟船只自行贩卖的故伎,转而与之同流合污,“或代为护送船只,或代为之送各处销、通同分肥”^①。为了赚取厚利,完全置民众健康、民族利益于不顾。为此钦差大臣林则徐 1839 年 3 月到达广州部署开展禁烟斗争时决心进行综合治理。他认为“现当查办鸦片吃紧之时,若兴贩烟土船只与匪徒合而为一,尤应实力严缉”^②。至 1840 年 8 月广东官方已抓获一大批劫抢掳贼重犯,至于帮会“聚会、打单”等犯“所获亦皆不少”^③。与此同时,全国其他省区也破获了不少贩烟吸烟的人犯和集团。在此种情况下广东、福建三合会等帮会很难立足本省,纷纷结伙越境北逃。林则徐前此虽曾有所准备,“恐匪徒远窜,越境为非。叠经谆饬各属,凡与邻省接界处所,无论通衢、僻路,均应详加盘诘,以杜通逃”^④。然而广东、福建两省还是有不少贩烟匪徒设法越境,并新立红会名目,列号分帮,“私带鸦片,潜入江西经销”^⑤。1840 年 9 月初,福建人江禄华在汀州府上杭官田地方,广东人李正昌在广东大埔、福建永定交界广福亭地方各自建立红会。“福建名太平帮,广东名长生帮,各由总头招揽烟贩,陆续编号,分列一号至九号”,每号数十人不等,“给红布旗一面,每人分给红布一条,挂在衣扣作为记认”,故名红会。^⑥红会成员在闽广当地杂货船上低价收购烟土,雇人护送出境,分往各处加价出卖。为逃避检查,蒙混过关,将“所贩烟土,或藏在夹板箱、雨伞柄、夹层竹箩底内,或棉袄、高底鞋内”^⑦,“并有受雇挑担,及在途会遇许给饭食沿路代为照应者”。各号总头则“按贩土多寡抽取厘金”,并交会内专人保管。^⑧红会用以招揽烟贩的会单上“载神祇保佑通

① 《军录》,御史周春祺奏折(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②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732 页,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③ 《林则徐使粤督粤未刊信稿》,《中山大学学报》1988 年第 1 期,第 91 页。

④ 《林则徐使粤督粤未刊信稿》,《中山大学学报》1988 年第 1 期,第 94 页。

⑤ 同上。

⑥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 3 册,第 142 页,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⑦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 2 册,第 663 页,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⑧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 3 册,第 142—144 页,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帮顺遂等语,并无违悖字句”^①,“系专为贩烟图利而设”^②。

同年9月下旬,清政府陆续抓获红会匪徒160余名,查获烟土5800余两及刀械等件。此外在乐昌县贩卖烟土的江西南安府上犹县人朱义兴等人也在1840年9月听从曾宝和在乐昌县小码头地方拜神结盟,加入红会,分领红布、尖刀。“红布一块挂在第四扣上,暗作记号”;“尖刀一把,以便贩烟互相帮助,以免他人抢夺。”^③红会匪徒在鸦片战争期间结党继续大肆贩烟,顶风作案,公然对抗正义的禁烟运动。清政府对红会的惩治和查办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禁烟运动中应有之义。

鸦片战争时期丐帮沙包会也活动频繁。沙包会原是广东丐帮恐人欺侮私相交结的组织名称,得名于乞丐用来煮饭的沙罐,俗称沙包。1840年3月江西南安府崇义县人饶受廷“因欲于墟期开摊诱赌,窝窃勒赎”,起意在该县古亭墟水口庙设立沙包会,纠合本县李保庭等61人“敬神结拜,以便聚行窃,互相帮”。同年9月饶受廷又筹划扩大组织,定于12月间纠邀多人序齿结拜。李保庭等人入会后仗势作案,“在崇义县抢窃钱米”,被清政府查获。^④据刑部侍郎麟魁奏称,“江西省拿获沙包会匪犯,讯系现获之饶受廷起意为首,与湖南省所获沙包会究出首犯名目相同”^⑤,由此可见饶受廷的沙包会势力已蔓延至邻省湖南。1841年在广东求乞度日的天地会会员、湖南宜章人王萧氏因“夫故无依”,“起意复兴沙包会名目”,辗转纠约徒众140余人,结伙行丐,强行告贷,在曲江、阳山一带乘便抢掠,直至1857年因在湖南宜章纠众抢劫,拒敌官兵而被清政府捕获。^⑥沙包会在鸦片战争时期依旧聚众行窃抢掠如故,扰乱后方社会秩序,从任何意义上讲都算不上反封建或有利

①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145页。

②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440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③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22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④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229页。

⑤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148页。

⑥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册,第554—55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

于社会进步。

1840年6月英国借口广东禁烟悍然派兵侵略中国,英国舰队封锁广州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1841年1月英军侵占香港,道光帝正式对英宣战。这时广东三合会的一些民族败类竟公然叛国投敌,充当汉奸,其臭名昭著的代表人物有卢亚景等。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英处在交战状态,素充英国兵船买办的卢亚景明知“官禁兵船火食”,仍“窜往香港裙带路,串通香山、新安奸民”,源源不断地为英国侵略军提供牛羊鸡豕面包等食物。在英军的庇护和支持下,卢亚景自充洋盗渠魁,“招集不逞之徒数千人,分驾草扁拖罾数百只,在虎门外洋面肆行劫掠”。卢亚景手下有3个坐舱贼头,“每起船或二十至三十只,每船贼或二三十人不等,火食炮械具备”^①。其余汉奸船只自立堂名,如联义堂、忠义堂之类,不一而足。^②英军、汉奸互相勾结,“汉奸附而不散,以夷船为巢穴,内犯则抢掠,外聚则走私”^③。1841年8、9月英军主力北犯闽浙后,留守香港海面的兵船所剩无几。英军便“聚集汉奸数千人,飘忽出入”,拦阻中国军民收复香港。^④据靖逆将军奕山等人奏报,“香港逆类招集汉奸,其著名头目卢亚景、邓亚苏、何亚苏、石玉胜为之勾引煽惑”^⑤,其中邓、何、石等立有联义堂、忠义堂各名目,均在香港,约计十余处。^⑥三合会匪船在国难当头之际乘机大干海盗勾当,以至于同年9、10月间广东出海货船,必须打单,否则劫掠虐杀,“洋面成盗藪矣”^⑦。广东当局认为,这些“助逆之汉奸,现有姓名堂名,原不难按名缉拿,无如该汉奸盘踞香港,逆夷为之包庇,查拿愈紧,则趋香港者愈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三),第25—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52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③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16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④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147页。

⑤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304—305页。

⑥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81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⑦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三),第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多。是以出示招致,如有洗心取面反正来归者,概赦不问,果能杀贼立功,更当格外加赏”^①。“内地多一壮勇,即逆夷少一汉奸”^②。至1841年11月已先后招回良知未泯的黎进福、石玉福等1000余名,安置虎门以外,暗听调遣。石玉福又持谕招回其兄石玉胜等200余人,并带回炮位器械俱全的大小船只4只。广东官方对受招抚者“的给口粮船价”,并从优加赏帮会头目。^③但首恶卢亚景则执迷不悟,顽固不化,起先坚拒广东当局的招抚,1842年2月虽勉强接受了清朝官方的六品顶戴蓝翎但仍借口滞留香港不归。他“外托于归命投诚,内恣其怀欺挟诈”,继续“包庇汉奸船数十只,替夷运货,而且驶入乡村,抢劫掳掠,无所不至”^④。广东三合会的一些人在民族战争中卖身事敌,为虎作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汉奸集团之一。

1842年6月英国舰队进入长江,溯江西上,一路焚杀劫掠,7月17日侵至镇江到仪征一带江面。清军“船只水勇,皆不敢摆敌焰凶锋”,只有仪征老河影地方的盐船“前见夷船即放抬枪”^⑤。不过这只是个别的现象,在当时并不占主导地位。为数更多的盐枭则乘机抢劫,大揽国难财。散在扬州四乡的枭匪乘扬州府城“居民大半迁徙,店铺全行闭歇”之际“肆劫”^⑥;仪征枭徒千余人扑向汤村抢劫。^⑦更有甚者,该县陆上枭徒竟然在外敌当前、国难临头之时仍然勇于“争私互斗”,于18日突然袭击水上枭徒“巴杆老”,“纵火烧毁盐船”。当巴杆老自卫反击时,停泊于附近江面上的英舰又向老河影盐船“连开大炮,火光烛天下”^⑧。“数千私枭几无噍类矣”^⑨。同一天盐枭汉奸在镇江“放火计毁二百余家”,

①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81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②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425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③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425页。

④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52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⑤ 《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3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⑥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⑦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三),第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⑧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⑨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三),第10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次日又“乘间抢劫军库”^①。事发之后署两淮盐运使但明伦等人“设法招集枭徒一千八百余名”充作乡勇，^②其中来自仪征的有283人。稍后江防扬粮二厅及沿江五十三州及宜陵仙女庙等大村镇的团练“亦皆半用枭徒”^③。但是未被招抚的那一部分盐枭依旧自行其是，危害社会，特别是“回畛多往六合一带乡间抢掠”^④。镇江附近“连日以来，盐枭处处蠢动，放火肆抢，虽经查拿数起，不能禁止”^⑤。7月21日英军攻陷镇江府城，又有“系由盐枭引导”之说。^⑥当时淮南盐枭“到处放火截杀”^⑦，致使“难民四散窜逃”^⑧。青帮盐枭趁火打劫，扰乱防务，荼毒百姓，大大加重了江南人民在鸦片战争中的灾难和痛苦。

鸦片战争在江苏境内激烈进行之时，数十万粮帮水手正在北上运输漕粮途中，尚未回空。再加上清政府各级漕运官员询访水手各帮头目，要他们“各就各帮约束水手，俾共安分，或自行团练，保护船只”^⑨，故迄今尚没有发现为英国侵略军利用之材料。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英国侵略者的武力胁迫下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鸦片战争宣告结束。清政府在《南京条约》中明确承担下保护汉奸的义务，凡以前“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俟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谕）旨，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⑩。这一规定使战时一批叛国投敌的帮会汉奸逍遥法外，也使他们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三），第104页。

②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20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③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43页。

④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1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册，第2126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⑥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4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⑦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第5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⑧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764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⑨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5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⑩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第67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及其同伙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故伎重演，肆无忌惮。同时《南京条约》对引起这场战争的重要争端——鸦片问题绝口不提，对走私贩运鸦片当然也无任何条款加以限制。因此战后鸦片贩卖有增无减，1840年中国进口鸦片20 619箱，至1850年增加到52 925箱。通商五口中的广州、上海、厦门成了三个最大的鸦片走私口岸。而这又与鸦片战后被清政府大批裁撤的乡勇无以为生，投入帮会，沦为匪徒烟贩有直接的关系。据记载，“粤东水陆撤勇逸盗，或潜入梧潯江面行劫，或迭出南太边境掳掠”^①。梧州本地战时招来的壮丁遭遣散后，“猾黠之徒，相聚为盗，烟贩盐枭之属，从而附和”^②。福建沿海各处招集的乡勇“迨后撤退之时，已觉费事”^③。而沿海漳州、泉州、兴化等府向受雇于商船者又因五口通商后商船大半歇业而“衣食无资，流而为匪”^④。江苏壮勇易聚难散，遣散之后“勾结土匪，乘间伺劫”^⑤。五口通商之后，闽广浙江等地失业水手流落上海者日增一日，“渐与本地无籍之徒，互相勾结，兴贩烟片，遇事生风”^⑥。其中就有上海小刀会的骨干分子在内。

由于战后赔款、财政紧张等原因，清政府未能妥善地解决战时招募的大批乡勇团练的善后问题，引起了这些人的不满和怨恨。各地帮会大量吸收无以为生的游民依附和投靠后，会员人数猛增，贩烟能量大为增强，经济实力也有所扩充。帮会势力日益坐大。

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表明，从事非法贩烟的经营是近代中国帮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可吸收大量的无业游民为其奔走效力，又可获取厚利作为维持和发展帮会的物质基础。对外来侵略的艰巨斗争中帮会也是唯利是图，缺乏明确的民族国家的概念，极易被民族的敌人所收买利用，无法充当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力军。

① 严正基：《记粤西贼情兵事始末》。

②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第45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③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281—282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④ 刘韵珂奏片，《史料旬刊》第36期。

⑤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391—392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⑥ 《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第33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